

序言二

中国诗歌理论简称“诗论”，亦可称“诗学”，此“诗学”非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指包括一切文艺之广义“诗学”，而是特指关于诗、词体裁之理论，是古人诗歌创作之实践经验和理论升华，其上溯春秋之《尚书》，下限清代王国维，连绵两千五百余载，就其自身演变过程而言，大致可分五个时期：

第一期，从春秋的《尚书》至东汉的《毛诗序》，这个时期是中国诗论的发轫期，此时的诗论虽并非完全是针对诗歌有意识而主动提出或总结的，但诗歌在文坛的核心地位已经形成，已经受到了普遍关注，可算是为几千年的中国古代诗论开了一个好头，此时提出的“诗言志”、“兴观群怨”、“温柔敦厚”、“言不尽意”、“知人论世”、“诗歌六义”等诗论，对后世诗歌创作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，特别是“诗言志”，可谓是这个时期诗论之核心。

第二期，从三国魏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至南朝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此为诗论自觉时期。伴随着文学进入到自觉时代，诗论也开始摆脱了经学束缚，有意识地总结诗歌发展的历史，多方面深入探讨诗歌本身特点和发展规律，并开始运用总结的规律去有意识地指导诗歌创作。此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，如“吟咏性情”、“诗赋欲丽”、“诗缘情”、“物感”说、“神思”说等。

第三期，从南朝钟嵘的《诗品》至唐朝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》，此为诗论独立发展时期。此时诗论大有发展，然总体发展滞后于诗歌创

作，此时的诗歌大家辈出、群星璀璨、作品充栋、美不胜收，可谓黄金时代，故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创作经验，只是还未来得及从理论方面加以总结和归纳。这个时期提出了“滋味”说、“天然去雕饰”论、“不平则鸣”说、“境生于象外”、“韵味”说等影响深远的诗论，横空出世的《诗品》和《二十四诗品》堪称划时代诗论巨著，其中提到的诗论主张已经触摸到了诗歌艺术的真髓。

第四期，从宋朝欧阳修的《六一诗话》至宋朝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，这是诗论的高潮时期。自欧公《六一诗话》问世，“诗话”这种采用自由漫谈的活泼形式来评论诗歌、流派、规律、诗人创作和记载相关逸事的形式，开始被诗论家广泛采用，相关诗话著作大量涌现，所提出诗论主张的广度、深度都有了大大提升，在艺术上提出了许多精辟、深刻的见解，如“穷而后工”、“诗中有画”、“点铁成金”、“活法”说、“诗家三昧”、“妙悟”等。特别是因宋词大盛于时，词论作为诗论的分支也建立起来，提出了“别是一家”说、“清空”说等。

第五期，从明朝王士禛的《带经堂诗话》至近代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，乃诗论体系建立和多元化发展时期，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诗论的终结期。这个时期的诗论非常丰富，且皆更具有理论性和指导性，对当时的文坛都起到了标杆式的指导作用，例如“格调说”、“神韵说”、“性灵说”、“肌理说”、“境界说”等，可谓层出不穷。而这个时期的词论亦发展成熟，特别是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吸取西方文艺理论基础之上，构建的“境界说”，成为了古典诗论的总结和现代诗论的开启，具有里程碑的价值。

中国诗论研究起源很早，然一般将诗论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部分进行研究，专门的、从古至今的，从作家、创作、渊源、流变、内涵、鉴赏、影响等方面全面研究诗论的著作较少。在研究过程中，还受到了几种不良看法的影响：

其一，认为诗论束缚诗人思想，妨碍诗人创作，这种想法是非常片面的，实际上，好的诗论便于对诗歌进行系统认识，只会对诗歌创作有

好的促进作用，不会对诗人创作进行强行规范和束缚。当然，诗论的提出一般是在诗歌创作之后的产物，是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总结和归纳，是千锤百炼的精华。中国许多大诗人其实也是大诗论家，如曹丕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欧阳修、梅尧臣、苏轼、陆游等，他们在创作中得出的宝贵创作经验对后世创作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。

其二，认为诗歌只需要品读、赏析即可，不需要诗论，甚至有人认为品读、赏析就是诗论，这是对诗论认识上的极端不足。诗论是对诗歌系统的认识理论，其可帮助读者更好了解这个时期的思想、认识作家创作思维和习惯、把握诗歌创作的精华，这些都可以更好帮助读者鉴赏诗歌，甚至可以说，诗论可以帮助读者去更高层次地品析诗歌，故诗论是为鉴赏服务的，但鉴赏绝不就是诗论。

其三，认为诗论研究是“形而上”的东西，是纯理论的东西，诗歌作品只是为诗论服务的附属品而已，这种从概念到概念，严重脱离实践的看法是掌握不到诗歌真谛的。研究诗论者必须同时研究诗歌史和诗歌作品，没有对诗歌作品和诗歌史的了解，就不能深入理解诗论。反之，研究诗歌史和鉴赏作品者也应当研究诗论，不了解当时的诗学思想、诗学潮流，就不能深入理解诗歌创作。

其四，强行将古诗论现代化，牵强附会地用现代的概念去比附古诗论，将古人没有的思想强加给古人，将古人的某一个诗论不加理解地拿过来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。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，我们研究和评价任何一个古人及其思想，都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，不能站在现在的立场去推测古人，更不能苛求古人，这种思想对研究诗论只有坏处，应坚决摒弃。

其五，为了出新，将西方诗论与中国古代诗论进行无意义的对比研究。在研究中国古诗论的时候要有世界文学眼光，要把中国传统诗论放到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来研究，要融汇外国一切优秀的创作经验来发展自己的诗论，这些观点都是对的，也是应该要做的，然并不是说就可以毫无原则地将外国的诗论与中国诗论强行对比，甚至以他人之长来批自己之短，要知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，生活方式也不一致，

诗歌创作的形式、技巧、格律等皆不相同，不能贸然对比。其六，言必称考据，贬低鉴赏，批评读者之论。有部分学者从作品论出发，一直强调诗歌研究就是考据，将诗歌考据作为诗歌研究最重要的方法，认为诗论研究只是考据的一部分而已，认为鉴赏诗歌不是真正的学问，更反对读者对诗歌的再创造理论。考据的确是诗歌研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，但绝不是诗歌研究的全部，就好比厨师做了一道可口的佳肴，考据学将佳肴的材料、火候、菜品、来源等考察得非常清楚，但就是不肯亲口去尝一尝，而诗歌鉴赏就是去尝一尝的过程，是读者用心与创作者沟通的过程，不同的读者也会得出不同的评判。故在诗论研究的时候要重视诗歌鉴赏和读者的再创造。

言而总之，中国诗论是伴随中国诗歌发展而发展，是时代精神的重要表现；是中国诗歌思想不断演化的精华；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诗歌上的体现，是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精神财富，值得研究，应倍加珍视。

以上论述仅一家之言，乃我在诗歌研究和教学中的一点不成熟看法，不一定全对，敬候诸家批评指教。

董小伟

2018年11月于马来西亚吉隆坡